

# 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孫克寬

## 一 前 言

蒙古人進入了中國之後，接受中國人的儒學思想，也曾搞過「以儒術緣飾政治」的把戲。不過在此治下的文化形態，始終是雙軌的。一是伊斯蘭文化，所用的是畏吾兒文字，那是成吉思汗戰敗乃蠻時，從俘擄中的塔塔兒人塔塔統阿那裡學來的。他叫塔塔統阿做了皇子的「說書人」，引進了許多文化制度以後，蒙古宮廷便以畏吾兒語言為通用的語言（註一）。削平西域以後，用回回理財，給與他們以政治權勢，又陸續引進些西域文明（註二）。這都是未進中國前打下的基礎。自從攻下中都，收用了契丹人耶律楚材，慢慢地認識了中國文化（註三），大量招收了北方漢軍，部分地以漢法治漢地（註四）。傳到第三代，蒙哥、忽必烈兩汗朝，漢軍的力量比重增加，漢文化隨之被重視，純正的儒生許衡、郝經等被引用而後出現了中統至元間儒治，我們名之為第一期的儒治（註五）。可是回回們憑藉理財的才智與傳統的政治力量，還是高踞儒臣之上，不斷地阻撓掣肘（註六）。最糟的是大汗與其皇子們，並不識漢文，漢人非憑藉怯薛們的汲引與舌人的傳譯，無法接近宮廷（註七）。以是儒治的局面，形成時斷時續的現象。自安童第一次罷相以後，第一期儒治，也幾乎隨之停擺了（註八）。所以者能够有元貞大德之文明小康（註九），促成了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汗慶延祐之儒治局面其關鍵要在於至元廿三年（西一二八五年）御史程文海「江南訪賢」之舉；這種由於大汗一時間，的小小措施，竟延續了中國文化在元廷的壽命，而且間接促成了支配後來明清兩代文人運命的科舉制度之出現，真是「涓涓之水，流為江河」了。爰就此兩事及程文海本人行實，略加考述，以饗讀者。

（註一） 以上所述情形，參閱元史卷一二三塔塔統阿傳，拙著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第四節註七原書三四頁。及蕭啓慶君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二章第三節。原書十七頁一十八頁。

（註二） 參考蕭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第二章第二節。十一頁一十四頁）。

（註三） 參閱拙著元初儒學（自印臺北藝文書局發行）。第二元初儒學之淵源關於耶律楚材部分（原書三二頁）。及元史卷一二七耶律楚材傳。又拙著蒙古漢軍及漢文化湛然居士集之中原儒士。

（註四） 參閱拙著元代漢軍人物表（大陸雜誌第二集）序言及元代漢軍與漢文化。（東海大學出版文星書局發行）。

（註五） 參閱元初儒學第二、三儒學表現時期四一頁及元代北方之儒。（臺北孔孟學報第八期）。

（註六） 如世祖時先後任用權相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皆西域人，培克財貨，蔑視漢文化，許衡退居於野，國學的膏火都不能供給。參閱元史安童傳（卷一二六）許衡傳（卷一五八）姦臣阿合馬，等傳（卷二〇五）

（註七） 參閱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元諸帝多不習漢文條。

(註八) 參閱註六所引資料。

(註九) 成宗改元元貞大德，頗晉用老成之儒臣，屢見虞集道園集碑志序引之文。

## 二 江南訪賢

### (一) 程鉅夫其人

所謂江南訪賢之舉，見於元史程鉅夫傳（卷一七二）程鉅夫本名文海，因為避武宗海山汗之諱而以字行，傳云：

「二十四年……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恂、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諫及文學之職。」

此事在元廷當日，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據元史世祖本紀載諸二十三年所說：

「廿三年春正月……集賢直學士程文海言：『省院諸司，皆以南人參用，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三月己巳，御史臺臣言，『近奉旨按察司參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程文海與行臺官，博采公潔知名之士以名聞，帝命賚詔以往……』」

這就是「江南訪賢」的本事。關於程文海的生平事蹟，除元史及新元史本傳外，我所見的有顧嗣立元詩選乙集程鉅夫詩小序（世界書局學術名著本）及宋元學案雙峰學案「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小傳（商務書局排印本）及清修四庫提要雪樓集小序，程氏身後當時另有揭傒斯撰的墓誌銘，及程世京所編的「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但因收在另一本雪樓集中，未能得見，只能就所見事料，加以引述。

程氏的籍貫是江西抑或湖北頗有疑問，本傳說：

「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

宋元學案却說他是：

「新建之吳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

此點不知是否據揭撰墓志？此文今本揭文安公集（四部叢刊本）內未收，未曾寓目，不敢遽定。顧編元詩選小序，及提要所稱皆與元史相同，在雪樓集卷三十有「六日到吳城山詩」

「過家上塚一流連，風景依然故可憐！」

似乎是吳城人，但新建屬於舊南昌道，與建昌並非一道，究不知何故。依中國地名大詞典所記：

「建昌路，元置，今江西豫章道東南部地，治南城，今江西南城縣治。

建昌縣……元升為建昌州，明降為縣，屬江西南康府，清因之。民國改為永修縣。雪樓集中，屢有先世與郢州關係之文字（註十）關於如何寄籍吳城之說，上引詩句之外，尚無所徵。他所以入元登仕是他的叔父降元的關係，本傳說：

「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

程飛卿宋元史皆未列傳。蒙古人的習慣，兩軍對峙，能降附者，即官其原職，北方漢軍大多以金軍將領投降，多是如此。南宋投降大將如呂文煥一家，范文虎、高達亦然，不過那是管兵而且鎮守一方的纔得到這樣的待遇。文臣如方回以嚴州知府降，也僅得原官建德總管，並

不能使他的兒子得到封土世襲的職位（註十一）何以程飛卿一員建昌的州判微官，降後却到得這麼優厚的待遇？文獻無徵，只好闕疑。

程氏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西一二四九）到瀛國公德祐二年（西一二七六）宋亡入元，已經二十九歲。在此之前，他受學於饒雙峰（魯）弟子程徽庵（若庸），宋元學案雙峰學庵程氏小傳說

「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於族叔徽庵」

雪樓集（卷十四）「雙峰先生文集序」：

「僕不肖少獲事徽庵程先生，知雙峰之學爲詳。」

又故將仕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吳君墓表銘」說：

「某少從徽庵先生於臨川」

臨川在南宋，是東南文學都會之一，大儒吳澄家於此，虞集僑寓於此，程氏在這裡讀書，得以與吳澄兄弟訂交，而又薰陶於理學風氣之中，纔能爲後來「奉詔求賢」的政治資本。

程氏登朝於世祖至元十六七年，而大用於二十二三年。那時北方的儒臣強半凋謝，南方的聞望之士如王應麟、金履祥等裹足不來，只有亡宋降臣狀元宰相留夢炎和漢奸王積翁等在朝（註十二），只有引起宋室遺民，江南遺民的痛恨，無補於安撫人心。所以江南義軍蠶起，我曾摘記史傳所紀江南義軍反抗事件爲「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的反抗」一文（刊香港民主評論十六卷六期）大約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起，至成宗元貞初年迄未寧息。客觀形勢也需要一番緩和的工作，所以程氏以一個疏遠微臣，少年新進，立談之間便蒙天寵，而擔任此一措施的主持者，並非偶然。

由於程氏深受南宋理學之薰陶，雖學家降附新朝，仍不忘保存中國之禮樂制度，尤其軫念江南民間之疾苦。他在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皆關於江南官民之事，所請江南御史行臺及按察司參用南人，實在是解除民困的「釜底抽薪」之舉。那時蒙古人以佔有者的姿態，囊括江南之子女玉帛，生殺由心，掙克無度。御史是糾彈官吏的，按察司是主理刑獄的，有一二南人參加，可以使北方官吏略有顧忌，却因此而迸出求賢之舉，引進一部分在野遺逸，也算是意外地收穫了。

程氏本傳以江南訪賢爲一大事，此外即輔佐仁宗皇慶延祐儒治舉行科舉之事，據說：

「至大（武宗）四年，……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錄……二年……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立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帥詔行之！」

這是他晚年的大節。由於科舉之行，南人拔茅連茹而進，有的主試舉子，有的新科及第，如揭傒斯，虞集等皆在此時嶄露頭角，而吳澄也主講太學，蔚爲許衡以後的儒學盛事，不可不謂皆自程氏發之。

關於程比出處詳考及文學著作，當另爲文考述，此姑不贅。

（註十）雪樓集有郢中先墓祝文「仰惟高曾，卜居於郢，再世經營，生計既定。」

（註十一）拙著「癸辛雜識方回事疏證」及方回詩評（收臺北學生書局出版詩與詩人中），記其出處。方退居杭州，其子中全北游是一小官，見戴表元方中全北行序。（剡源集）

（註十二）留夢炎相宋慶宗臨危奉降表入元，世祖使趙孟頫作詩嘲之，見趙氏本傳。王積翁新元史有傳（卷一七七）奉使日本，舟中爲部屬所殺。

## (二) 南來名士

江南訪賢之收穫 爲世所稱道的只是趙孟頫、葉李的北來。葉李是以在宋末以太學生上書攻訐權相賈似道的關係，被世祖忽必烈汗所重視，刻意網羅他入朝，趙孟頫却是程文海的薦舉，因爲世祖指名的趙孟頫，並未應詔北來，松雪與孟頫是兄弟行，拉他北上，也可以塞責了。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紀此事（圭齋集卷九）

「侍御史程公文海出訪江南遺逸以應詔，公在旨選。」

松雪北來，以趙氏王孫，挾書畫的絕技與詩文的眞賞，果然傾動朝野，得到世祖的寵待。筆者舊著松雪齋集題記（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四期元人別集小錄三續）有「松雪生平與其詩學」一節，曾加述論，此不再贅。葉氏傳在元史一七三卷，記其入元事說：

「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必得葉李來』！」

葉李以攻賈一疏而顯名，其人却非正人。入元以後，與江南士大夫並不融洽，却投靠權相桑哥。桑哥既敗，江南儒生揚州學正李淦上書言。

「葉李本一黥徒在宋以攻賈被削籍充軍，纔近天光，即以薦桑哥爲第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佑…罷御史大夫門答占……侍御史程文海。」

事載葉氏傳末，可見其人不過是一縱橫權謀之士而已。趙葉兩人之外，程氏所薦賢士，以吳澄爲最有學術地位，對南學北來影響最大。吳與程氏同學於程微庵之門，宋元學案別爲草廬學案，元史吳氏本傳（卷一七一）記此事

「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

吳氏北上，官雖未登臺閣，但所學却大行其道，前此有程氏的揄揚，後此有虞集的尊奉，虞氏所撰吳氏行狀，叙次學術與其出處心迹，最爲精切。筆者有元代南方之儒一文（載臺北孔孟月刊）曾略詳述其事。松雪齋集送吳幼清南還序（卷六）

「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氏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賢，達時而知務，誠稱所舉矣。既至京師，吳君翩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

氏首次北來，怏怏而歸，那時正桑哥當權，以言利爲急，程鉅夫且被排外出，何況所薦之人。故趙氏此文有：

「吳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

可見當時北來南儒的心情了。吳氏與程的交誼極深，我想將來有機會評述雪樓、草廬兩家文集時，再爲細論。

由於江南訪賢，其動機不過爲參用按察司與御史行臺之人選，故所薦之人，仕途多未大展，行誼多埋沒不彰，只張伯淳一人較爲顯達 其墓志見雪樓集，其餘 名見雪樓集者 還有胡夢魁、曾沖子、王泰來諸人，各記如下：

張伯淳：傳在元史一七八卷，柯史新史卷一八八〇元史傳文甚簡。在宋時爲幕官，入元於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後入朝屢預大議，大德四年，即家拜侍講學士。其學術並無發明，新史較詳，據云：

伯淳與妻弟趙孟頫俱以文學擅名，其文源出韓愈，謹嚴有法，得立言之體，著養蒙集十卷。

雪樓集有「翰林學士張公墓誌銘」，即伯淳墓銘。據云：

「……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聞廷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乃薦之。明年招命，有旨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上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公晉居憲幘。」

此文亦只稱其治行，未及其文學造詣。大約張之被薦，或許是松雪親戚，「拔茅連茹」而被薦舉的吧。

胡夢魁未登史傳，雪樓集有「僉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據云：

「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官，歸國朝，奉母還里……適余將指傍求，遂薦於上。」

曾冲子：名登新元史循吏傳（二二九卷）此人是撫州金谿人，雪樓集有「僉福建提刑按察司事曾公誌銘」，據云：

「……其先徙居撫州金谿……冲子字聖和，公也。……守南安軍……未幾罷郡歸。至元二十四年，憲臣奉詔選士，公起家，授承直郎，僉福建提刑按察司事。」

其人似極有吏材。

余恁：名見新史循吏傳黃順翁傳云：

「旋擢武岡路新寧縣尹……新寧人即順翁種竹之處立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恁題曰種竹堂。」

余恁傳記尚未發現，雪樓集有祭余秋山廉使文，似即此人。據云：「歲丙戌蒐賢東南，公適在盱，首以應詔。」此人官至江西廉訪副使，他與胡夢魁、曾冲子都是一流人物。

王泰來：其人不見程氏本傳薦賢名單內，但松雪齋集「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卷八）却撮記他的生平，頗有國士之風。據說：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故爲華亭人……二十三年，侍御史程公鉅夫……奉旨顓召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與偕見，館于集賢院……」

王泰來以與葉，意見不合而退居田里，雪樓集中亦沒有和他往還的詩文。

江南訪賢所得的名士，事蹟可見者，暫時只得此數，由於南士之紛來，遂促成後來仁宗延祐的舉行科舉，蔚興儒治，而仍以程鉅夫爲其關鍵人物。

### 三 延祐儒治

#### （一）仁宗用儒

元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海山汗之弟，武宗之所以能踐大位，實在是這位「太弟」之力。他在蒙古人各代皇帝中，與文宗圖帖睦爾二人算是漢化較深的。尤其是他，接近儒臣，興復儒治，出於誠意，並不似文宗的有意粉飾。他在藩邸，得李孟爲師傅，深受他的濡染，也由於李氏悉心輔佐，才戰勝宮廷的「奪權鬭爭」。元史仁宗本紀所紀他的仁政，很有點宋仁宗的風度。由於他接近儒臣，因此恢復了停罷已久的科舉，並且訂定了以道學經義爲主的考試科目，一直行之於明清兩代，在這方面看來，文治的績效，實在不亞於世祖忽必烈的中統及至元初年之治，所以我名之曰「元代二期儒治」。

元武宗仍不脫草原粗獷的氣習，近臣弄權，色目人當政，朝政相當紊亂。仁宗既正位，

首先即召用世祖時推行儒治的老臣，仁宗本紀：

「至大四年<sup>仍武宗年號諭年始能改元</sup>正月……壬子日……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重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張驢、右丞陳天祥、尙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賓客蕭剌、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御趙君信、廉訪使程鉅夫……等，給傳詣闕，同議政務。」

這是新政第一炮，賢人進而小人自退，儒臣用而近戚自遠，這許是李孟的調度。其間程鉅夫雖僅奉陪末座，可是却做了儒治的推進力量。因為他做了翰林承旨，得在皇帝左右司掌詔命，取得了「內相」的地位。元史程氏本傳說：

「至大……四年與李謙、尙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留爲翰林承旨。」

仁宗之重視儒生，在藩邸即如此，要得力於他的漢文師傅李孟，李氏傳在元史卷一七五，柯氏新史卷二二一。據元史傳：

「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漢中。……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言。……仁宗侍昭憲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嘗單騎以從。……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仁宗深納其言……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巨巨父父子子之義。……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巨語獨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爲此其固者，實孟啓之也。」

從這一般看，李孟對仁宗的「蒙以養正」之功，實在是用儒的前奏。可惜仁宗之世，母后干政，寵信蒙古人鐵木迭兒，常常妨害儒生，敗壞政治，使他不能盡其所學，所以儒治的表現止於恢復科舉一事，其他都是具文。

仁宗本紀所紀儒治的表現，還有以下各事：

「至大四年：命中書平章事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校人材所有出師等宣數詣國學，課試詣生，勉其德業。』」

由於注重國學，一代大儒吳澄才登入國學，作育諸生，養成了像蘇天爵那樣的儒學名臣。本紀又載

閏七月：丁卯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學，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庶學者有所激勸。」

又載：

「皇慶二年……六月：甲申建崇又閣於國子監之心宋儒周敦頤、程顥、顥弟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承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

升宋五子於孔子廟廷，使宋儒道統完於一尊，這大概與肄習理學的南方儒者所建議，虞集傳記此時事曾有：

「仁宗……拜臣臺爲祭酒，除吳澄司等，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

程雪樓集大元國學先聖廟碑卷六紀建立上都先聖廟及尊宗宋五子之事說：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祚百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邇

治，可樹碑於廟。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弟子員爲三百……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國家用耳。……」虞氏道園集，許有壬至正集，蘇天爵滋溪文稟都有國學碑志，皆可以見仁宗用儒興學的盛況。尤其是蘇天爵氏於「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李文簡公（衍）神道碑」文首段誇說其事（滋溪文稿卷十）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方內安寧，乃興文治。一時賢能材藝之士悉置左右。……當是時宿學碩儒，名能文解翰墨者，若洛水劉公賡，吳興趙公孟頫，保定郭公貫，清河元公明善，皆被眷顧，士林眷顧以爲榮。」

這些人都是有地望的儒臣、李孟、程鉅夫復周旋於其間，再加上科舉所得的名士，這就構成元代二期儒治的中堅力量。

## （二）延祐開科

科舉在歷代政治上並不是什麼十分完善的制度，但在元代漢文化被踐踏的狀況下，科舉却是保障漢儒生的生存，延續漢文化的傳衍，允稱大事。元史選舉志序論說：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襁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

仁宗本紀記此事於皇慶二年說：

「十月：甲辰行科舉，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李孟傳紀此事說：

「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於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詞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可見科舉之行，實出於李孟的建議。但宮廷內也有人助成其事，元史陳顥傳（卷一七七）

「及仁宗即位……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關，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居多。」

陳灝與程鉅夫頗有交誼，雪樓集中有陳氏先德之碑紀其家世及灝本人的榮遇。關於用經義及程朱之說課士，程鉅夫之功居多。前引程氏本傳：

「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積弊』，命鉅夫草詔行之。」

選舉志紀此事說：

「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章乃摘章繪句之學。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賦詩小義皆不用，專止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幾得人。』帝然之。乃下詔：」

此詔書即程鉅夫所撰，載雪樓集卷一，全文如次：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才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宜，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興其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

庶得真儒之用；夙移俗易，益臻至治之誠！」

這次所訂科舉制度及考試科目，竟做了以後各代取士的定制，不但宋儒義理之學，成爲讀書人必治之學，八股文章也成了一代的文體，對士習，「崇實黜華」的理想，雖未必做到，可是「學定於一，文歸於散」却成爲定局。故虞集跋雪樓遺稿把端正文體之功，歸於程鉅夫，是這樣說的（道園學古錄卷四十）

「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

所謂古文，自韓歐以來，即以經術義理爲內容，程氏文格如此，他理想中的文章標準，當然也是經義之文；所以施諸科舉來丕變文風，與歐陽修在北宋仁宗時主持貢舉，變革文風，同是一般作風。

### （三）科舉名流

蘇天爵（生平見拙著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滋溪文稿，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說：

「延祐乙卯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今三十二年，以文詞政術知名者十餘人，不幸才勿滿用而歿者又十餘人，宦之崇卑，則在所不論也。」

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元年……二月之己卯朔會試進士之三月乙卯試進士，賜護都沓兒蒙古人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此事亦載於選舉志。此次首行科舉，典試與所取之人，儘多碩學名儒，狀元張起巖傳列於元史卷一八二據說：

「字夢臣，章邱人……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翰林爲承旨，充總裁，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

此傳復誇張他與仁宗同日出生爲文運興起的瑞兆說：

「先是至元乙酉（二十二年西一二八五）二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是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

從傳文看，當然本諸張氏家傳，可見那時文人們是多麼重視此番盛典啊！是科登第者又有許有壬，元史本傳稱（卷一八二）：「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此傳曾載當時試官之名云：

「初有壬舉進士，知貢舉李孟。參知政事趙世延（色目人）學士趙孟頫第高下未定。世延曰『觀此策異日必爲名臣，請置第二甲。』孟不許，世延辯論不已。孟頫立請曰『宋東南一隅，一科取士數百人，以國家疆域之廣，正七品多取一人，不爲濫也。』孟乃從之！」

許有壬爲元末漢人中有名的宰執，最近我寫至正集題記，詳述他的生平，已刊佈於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此處不再贅。又有歐陽玄，是順帝元統間負重望的儒臣，纂修宋遼金三史，本傳（元史一八二卷）亦記之說：

「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尙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

歐陽玄的文章，典重紆徐，雅似其先世歐陽修的風格，是元末的大手筆。所著圭齋集，因元亡後收拾遺文，諸多殘佚，但幾篇重要的碑版，如虞雍公（集）神道碑，許文正公（衡）神道碑，都是有關元代儒學的重要文獻。其人與許有壬及同時稍後的蘇天爵，色目文人馬祖常

等都有甚深的交誼，宋史修成，保存故國文獻，也算是大有功於元代漢文化的保持流行了。

以上三名臣之外還有一位大詩人楊載仲弘也應首科的進士。本傳（元史儒學卷一九〇）

「……四十不仕，以布衣待詔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

楊氏與揭曼碩、范梈和虞集詩名相並，當世稱「虞楊范揭」，傳世有楊翰林集，僅收詩篇。至於揭曼碩，雖未登科，但在延祐元年被薦翰林國史院編修，順帝初年同修三史，集名「揭文安公集」。歐陽玄爲他撰墓志銘，備加稱揚，附記以見延祐開科之盛。

× × × ×

以上所考述的江南訪賢與延祐開科兩事，其中心人物爲程鉅夫，旨在說明他對元代儒治與漢文化活動的重大關係。文字粗疏，實不足以發明，他日有暇，當對雪樓集與程氏學行和他周遭的關係人物，詳加鉤稽，再爲詳論。

五六、五、四、稿成於臺中大度山園

## Search for Southern Worthies and the Civilian Control under the Reign of Yen Yu

*Sun Ke-kuan*

When Mongols first conquered the China proper in the Yuan Dynasty attempts were made to preserve the Han culture through the employment of the Han officials. The development was at last frustrated by a group of chancellors from the Chinese Turkestan.

In 1286 Cheng Chu-fu, a Han Chinese, came to be prominent in the court and suggested again the search for Southern worthies. The suggestion was especially favored by Emperor Jen Tsung, and a new climax of the civilian control was thus brought about during the years 1312-1315 under the reign of Yen Yu.

## 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孫克寬

蒙古人進入中原，統治漢土，先有耶律楚材佐太宗（窩闊臺）建議用儒，引進亡金儒士，與北方漢軍將領等保存漢文化，初步施行儒治。三傳至世祖（忽必烈）晉用大儒許衡等，施行漢法，中統至元間，儒治極盛。但以西域人阿合馬等相繼爲相，阻撓漢法，一度中衰。程鉅夫以南方儒生登朝，（西一二八六）建議搜訪遺逸，徵用南儒，奉詔「江南訪賢」，使趙孟頫、吳澄等北來，爲儒治注入新機。至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延祐間（西一三一二—一三一五）採納李孟、程鉅夫之意見，恢復宋金以來之科舉制度，專以經義取士，（即世傳之八股文體）提高儒學在元廷之地位。其關鍵在於「江南訪賢」，爰加考論。